

文化相对主义的起源及早期理念*

杨 须 爱

西方思想史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先是于18世纪出现的一种反叛法国启蒙思想的理论主张,尤其表现为对法国文化霸权、科学理性主义等的批评反思。文化相对主义学派则是20世纪初期出现在美国文化人类学界的一个学术流派。二者的产生时间、批判对象虽然不同,但基本思想却一脉相承。西方相对主义哲学传统、反启蒙信条、“文化”观念和民族理念是早期文化相对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维柯与赫尔德是文化相对主义早期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论述实际上形成了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之后,这一理论逐步扩散至西方整个社会思想领域并发展、变化,至19世纪末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思潮。文化相对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多元论、文化多样性理论、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也是近百年来主导西方人类学的一个思想理论,它的影响力今天仍在持续。

关键词: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学派 理论来源 早期理念

作者杨须爱,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32。

文化相对主义在中西方民族理论,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中是一个热门词汇。但它本身又是一个历史的观念,在不同理论语境中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①若归结起来,其共同的要义为两条:一是极力推崇自身的文化及价值;二是反对在不同文化之间作价值比较及排序。由此,似可以对观念史层面的文化相对主义作如下界定:一种以张扬自身文化旨趣,反对在不同文化之间作价值比较及排序的思想观念及理论主张。

在西方思想史上,文化相对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多样性理论、文化多元论、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而且,作为一种传统,主导着近百年来的人类学(包括民族学——笔者注)这一学科,^②故其关涉的议题在中西方民族理论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论题。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发端可追溯至18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产生之后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长期(至今仍在持续)和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对西方民族理论和人类学理论)。西方学者对此

*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王希恩研究员给予了诸多指导,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及责任编辑马俊毅副编审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人在此一并诚挚谢意。

① 英国学者大卫·彼得尼(David Petroni)对“文化相对主义”这一词条作出的解释是:“(1)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中的一种方法;(2)一种文化决定论和文化现实哲学;(3)一种关于伦理、政治和美学体系的评价指南;(4)一种对于社会文化改革与变迁的实际问题的态度。”(傅铿著:《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② 参见[美]劳伦斯·哈里森著:《文化为什么重要》,[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英国当代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Sir I. Berlin)、德国当代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及当代著名的民族理论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等人的研究较为引人注目。但总体上看,西方学者的研究仍然比较分散,且以间接性的论述居多。^① 在国内学界,特别是民族学(人类学)界对文化相对主义及相关议题的研究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目前已产生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但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相对主义的评析及反思;^②二是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策略等相关的一些议题。^③ 而且绝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将文化相对主义视为产生于20世纪初期美国文化人类学界的一个学术流派及学说,对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基本停留在与此相对应的范围内。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国内学人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对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运动和西方民族理论影响的认识,至少在纵深性和广泛性上如此。本文拟以国内外学界已有研究为基础,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的联系与区别、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来源、文化相对主义的早期理念及扩散作一考察,以期能对国内学界已有研究的不足有所弥补。

一、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学派

国内许多研究者之所以认为文化相对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是以“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概念和学派的出现为依据的。^④ 其实,虽然作为一个理论术语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最早出现在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vard A. Westermarck)1908年发表的《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文化相对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也才出现,但无论从韦斯特马克提出“文化相对主义”这个术语时赋予它的思想内涵,还是从“文化相对主义学派”出现时的主要理论主张来看,^⑤文化相对主义思想早在人们这样明确称呼它之前的18世纪上半叶在西方思想史上就已经出现了。

1725年,意大利文学家、欧洲反启蒙运动的先驱维柯(Giovanni B. Vico)在对法国启蒙思

① 以赛亚·伯林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维柯与赫尔德》、《浪漫主义的根源》、《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等著作之中。参见Sir I. Berlin, *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76; [英]以赛亚·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英]以赛亚·伯林著、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陆月宏译:《历史主义的兴起》,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安东尼·史密斯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此外,当代美国知名哲学家理查德·塔纳斯的著作《西方思想史》,对此问题亦有较多涉猎,参见[美]理查德·塔纳斯著、吴象婴译:《西方思想史》,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国内学者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李安明:《试论文化相对论》,《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费从军:《文化相对论评析》,《南开学报》1992年第3期;马庆钰:《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罗康隆:《文化相对主义研究述评》,《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等。此外,已故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亦有相关章节对文化相对主义做出了相关论述,这一论述在目前的研究中有较高的引用率。

③ 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葛红兵:《走出民族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2期;伊克巴尔·吐尔逊:《文化相对主义与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问题》,《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④ 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马庆钰:《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等。

⑤ “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的核心理论主张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任何“民族”的文化,包括行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它们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第二,人们不能用本民族或自身的文化价值标准去衡量或评判另一种文化的价值。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第133页。

想的科学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时最先阐发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思想。因此,文化相对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理论批判工具而出现的。维柯的这些思想被德意志东普鲁士时期反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约翰·哈曼(Johann G. Hamann),以及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鼻祖、“浪漫主义”^①的代表人物赫尔德(Johann G. Herder)等人继承和发挥,从而形成了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主要思想内涵及理论主张将于后文详述,此处不赘)。其后,这一思想观念进一步被众多反对“纯粹理性主义”,以及一些反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所继承和发挥,并扩散至整个西方社会思想领域,弥散于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科学史、人类学等学科领域,至19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在西方思想界成为一种文化思潮。^②

“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术语和文化相对主义学派则是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学科化、专业化的产物。其中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是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并于20世纪前半期在美国文化人类学中居主导地位的一个学术流派。在思想脉络上,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开创的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所秉持的方法论和主要理论主张,其实是对18世纪形成的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运用,也是19世纪末期以后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美国文化人类学界扩展的结果。事实上,博厄斯也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犹太裔家庭,在德国完成大学教育及获得博士学位后才移民至美国的人类学者。研究表明,他移民至美国后的学术方向无疑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和“历史文化哲学”的影响。^③博厄斯的学说所贯穿的核心思想为:各个种族或民族的智力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各个民族的文化也没有高低与好坏、进步与落后之分;“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独特之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因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没有普遍的绝对的衡量标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④博厄斯的这些思想被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等人的许多弟子作为开展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而加以继承和发挥。其中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还于1948年在其名著《人及其创造》中提出了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说”。^⑤实际上,博厄斯的上述论点,在维柯和赫尔德等的论著中大多都能找到原型,在19世纪末期以来许多思想家的论述中也能找到思想的踪迹。当然,博厄斯等人对前贤们思想的继承已不是简单的观点转述,而是有了更多维度上的展开与发挥。他所批判的理论对象成为文化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针对的社会弊端成为种族主义,而这与维柯、赫尔德所批判的理论对象和社会现实均不相同。

所以,从产生的时间上讲,西方思想史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应该是最先于18世纪上半叶在意大利出现的一种反启蒙信条、反科学理性主义的思想观念。从包含关系上讲,早期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流派的文化相对主义都应属于西方思想史中文化相对主义的范畴。

① 浪漫主义(Romanticism),指18世纪中晚期开始于西欧艺术、文学领域的文化运动。它以艺术和文学反抗对自然的人为理性化,主张重视民间艺术、自然以及传统,主张一个根基于自然的知识论,以自然的环境来解释人类的活动,包括语言、传统、习俗等。所以这一文化运动是对启蒙时代以来的贵族和专制政治文化的颠覆。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编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0、671页。

② ③ 参见[英]阿兰·巴纳德著、王建民等译:《人类学历史与理论》,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④ [美]弗朗兹·博厄斯著、刘莎等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⑤ 参见Melville J. Herskovits,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 Abridged Revision of Man and His Work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55, p. 351.

在此还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学派之所以在20世纪初期出现,既与文化相对主义学术思想本身扩散直接相关,也与文化相对主义与生俱来的部分理论特性和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的大背景紧密联系。

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之所以最先在18世纪产生,其直接的社会根源是当时的法国人以启蒙的名义对外推行的民族侵略和文化霸权行径在意大利和德国境内大行其道。而文化相对主义正是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知识精英们,针对法国人的文化霸权行径以及对“落后”民族人文主义精神的贬抑做出的理论回应。所以文化相对主义从产生时就包含有反对民族压迫和文化霸权主义、追求民族文化地位平等,乃至追求民族解放和民族自立的意涵。而基于这一理论特性,文化相对主义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也就很快受到了许多遭受异族奴役及文化压迫的民族(种族)知识精英们的欢迎,成为他们摆脱民族(种族)奴役、文化压迫和实现政治自立的思想利器。

20世纪前后,种族主义、民族强制同化政策等极端不公的制度化社会行为在西方社会盛行。在此背景下,文化相对主义自然也就成为西方一些怀有人类良知的学者批判这些不公社会行为的首选理论工具。譬如,基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的批判,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在《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1908年)一书中率先系统论述了“道德相对主义”,并明确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术语。基于对种族制度、“熔炉论”及“美国化”运动这一民族强制同化政策的批判,美籍犹太裔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M. Kallen)在《民主与熔炉:美利坚民族的研究》(1915年)一文中,提出和阐发了“文化多元论”思想。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的批判,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1918年)中阐发了他的新“历史哲学”(也称为“文化形态学”)。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于对文化进化论、种族主义的批判,博厄斯才直接将“文化相对主义”作为开展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从而创建了“文化相对主义”学术流派。

二、早期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来源

文化相对主义之所以发端于18世纪初期的意大利,有着宏厚的思想背景。西方“相对主义”哲学传统、“文化”的观念、反启蒙思想和民族理念等是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

(一)“相对主义”哲学传统

西方相对主义哲学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智者派哲人们的论述,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是相对主义哲学思想的鼻祖,他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①是这一思想的核心表述。智者派哲人们的思想带有强烈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认为“一切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没有不变的真理,一切都可以怀疑,一切被人们奉为规矩的常理都能在论辩中被推翻”。^②智者派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思想虽然从产生起就受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激烈批判,但这并没有消除这一思想在后世的流布。相对主义哲学思想作为对绝对主义的否定命题,像一股暗流一样始终存在着、流动着,尤其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脍炙人口的名言,不断地被后来的哲人们引用,以表示各种不同的思想。

^①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②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39—40页。

西方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在哲学领域出现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野。其中,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被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约翰·洛克(John Locke)、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等人所继承。尤其是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证明了事实真理同逻辑或数学中的先验真理之间不存在逻辑关系,这大大加强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想在当时西欧哲学界的影响。此外,来自新绝对主义、科学理性主义的压力及对其进行的抗辩,也促进着相对主义思想的发展。例如,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从“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出发,提出了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绝对主义学说——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这种学说“否认历史、文学文化和拉丁学识的全部价值”,否认“人文主义的内在精神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它企图通过“数学理性和机械论来理解生活和人类灵魂本身”。^①这对意大利自文艺复兴以来确立起来的人文主义理想是一种严重打击。所以18世纪初期,意大利那不勒斯学者维柯就率先以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论调,发起了对笛卡尔“唯智主义”的抵抗,为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历史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②这里的“历史主义”指历史相对主义,其实质就是文化相对主义。

(二)“反启蒙”思想

科学理性主义和进步观念是欧洲启蒙思想的两个关键性概念。^③科学理性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属于绝对主义思想体系。从古代理性主义、中世纪理性主义,一直到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代科学理性主义,始终是一元论的主调。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相信:第一,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必然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第二,这类真理的发现必然有可靠的途径;第三,这些正确的答案,彼此必然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④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乃至19世纪以来的主流哲学体系和进步思潮,都基本接受了这个基本的思考框架。进步观念的确立是在西方哲学进入近代以后才完成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促进着这一观念,尤其是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充分显示的知识和理性的力量代替了神的权威,成为进步观念的支撑点。因此,进步观念的确立是科学理性主义在启蒙思想中的另一种展现。

但在法国启蒙运动兴起之前,缘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潮流:一种是在科学革命中显露出来的,强调理性、经验的科学和怀疑宗教的“世俗主义”;另一种是强调人类经验和心灵感受的“浪漫主义”。后者在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中具有共同的根基,它体现的是那些“压倒一切的理性主义精神所抑制的各种人类经验”。^⑤启蒙思想家们在追求一个能够笼罩全局的终极答案,启蒙精神颂扬的是理性至上、社会进步至上,肯定的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理性智慧及其理解、探索自然规律的能力。但“浪漫主义”或反启蒙的思想家们,向人们展示的则是另一种思考眼界,他们认为“在道德、文化以及生活形态等方面,人类所面对的其实是杂多而且无法调和的目的、价值和认知”。^⑥反启蒙思想

① [意]卡洛·安东尼著、黄艳红译:《历史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② 参见[意]卡洛·安东尼著、黄艳红译:《历史主义》,第39页。

③ 启蒙运动或启蒙思想源自欧洲思想家们的这样一种认识:人类的过去基本上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只是到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向光明;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人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人要好;在人类理性主义的力量之下,人类不断进步的状况可以得到保持。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④ 参见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

⑤ [美]理查德·塔纳著、吴象婴等译:《西方思想史》,第403页。

⑥ 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第190页。

颂扬的也是“不可言喻的灵感”，肯定的是人生无穷无尽的戏剧性，是人类的灵感、艺术的创造性以及个体自我表现和自我创造的能力。所以，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中，哲学意义上的实在物是具体的、如实的和单一的，但在反启蒙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实在物则是由符号性的、“由多重意义甚至对立面组成的变化多端的综合体”。^①而维柯正是反启蒙思想的先驱。^②他的反启蒙思想针对的是笛卡尔的“唯智主义”及它对意大利人文主义传统的贬抑。维柯的这些思想在19世纪前后，则被德国哲学家哈曼、赫尔德等人继承和进一步发挥。

(三)“文化”观念

“文化”(culture)一词最初出现于欧洲各民族的语言中时，并未获得我们今天所赋予它的意蕴。在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它的基本含义是“耕耘”、“掘种土地”和“园艺”。《牛津词典》把1510年作为该用法在英语中首次出现的日期。^③这一最初的含义今天仍在“农业”(agriculture)和“园艺”(horticulture)两词中保留着。

今天人们所讲的文化观念的确立，是与反启蒙思想的出现同步的，最早表达具有现代含义的“文化”观念的思想家仍然是维柯。他在1725年发表的《新科学》(此著全称为《关于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任何特定社会的所有行为都有一种特征或普遍的模式；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其思想、艺术、制度、语言、生活方式都反映出一种共同的风格。这种普遍的模式或共同的风格便是文化。^④并进而说，思想、情感、世界观等各类行为以及肉体的、情绪的、智识的、精神的等多种反映的本质构成了文化。伯林讲，在维柯之前，“没有谁有过这样的想法，要努力去重构人们是如何看待生活在周围环境中的自己，如何看待(或感受)与自己发生关联的自然界和其他人——作为在时间中持续存在下来的一类生灵”。伯林由此进一步明确指出，维柯是理解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人，是他不自觉地确立了文化的观念。^⑤而这一看法在学界也几乎已成公论。

而“文化”的观念，正是维柯反启蒙思想的基点。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维柯对笛卡尔“唯智主义”不言明的批判和对意大利传统人文主义精神褒扬，都建立在这种认识之上：文化是由特定社会所有行为的模式构成的，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完全独立的。近半个世纪之后，赫尔德在呼吁德意志知识精英们重拾民族自信，摆脱法国人及法国文化的奴役，所依循的理由也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四)民族理念

西方思想史中的“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术语和观念，“民族先于民族主义而存在”。^⑥中世纪后期以来出现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奠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⑦也确立了民族国家建立的思想依据。但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运动，民族观念在18世纪以前的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这样的特点：反对罗马教廷对各国政治上的控制，主张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独立的民族教会；拥戴王权，反对贵族势力分裂割

① [美]理查德·塔纳著、吴象婴等译：《西方思想史》，第406页。

② 参见[美]马克·里拉著、张小勇译：《维柯：反现代的创生》，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部分第5页。

③ [美]菲利普·巴格比著、夏克等译：《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④ 参见Sir I. Berlin, *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 xvii.

⑤ 参见[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著、杨祯钦译：《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⑥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⑦ 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据,要求建立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宣扬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主张使用本民族语言,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①显然,从一开始,民族的观念与启蒙思想就不是一种十分投契的关系。因为启蒙思想志在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社会、思想、道德及政治问题的道路,宣扬的是世界主义观念,与其连接的理论依据是科学理性主义哲学。而民族观念追求的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和效忠,对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弘扬,对本民族成员的团结的维护,以及本民族利益的独尊等。所以,当18世纪前后法国知识界以法兰西文化最具优越性的名义对意大利人文主义传统和德意志民族文化进行贬抑时,意大利和德意志知识精英们也以同样的名义,即以强调本民族文化具有无上价值的名义,发起了对法兰西文化霸权的抵抗。维柯、赫尔德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维柯于1725年发表的名著《关于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理》,正是基于对18世纪前后法国文化霸权主义的反叛而作。显然,“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理”的立足点便是“民族”,他论述的“民族”原型即为意大利人,这已近乎我们今天所说“意大利民族”。尤其是他在批判笛卡尔的学说时已经展现出非常明确和“强烈的民族意识”。^②19世纪前后,赫尔德、歌德(Johann W. Goethe)、费希特(Johann G. Fichte)等人在启发德意志知识分子摆脱法国人的奴役,寻求民族自立的道路时所阐发的思想,有许多追随了维柯的观点。其中赫尔德的表述中德意志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关键性概念,而这已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内容了。在维柯之后,康德(Immanuel Kant)的“个人自决”理论被引入民族观念之中,而作为一个现代性术语的“民族主义”也于18世纪末期出现在赫尔德的论著中。^③

至此可以讲,“文化观念”的确立及其与“相对主义”哲学思想、反启蒙思想、民族观念的结合,形成文化相对主义思想。而这几者之间似乎也呈现出这样一种关系:“相对主义”哲学传统为文化相对主义的萌生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反启蒙思想和文化的观念及二者的结合为文化相对主义的发芽提供了思想土壤,而民族观念的流布则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破土打通了出口。

三、维柯与赫尔德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④文化相对主义之所以在18世纪的出现,一方面基于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文化霸权、追求民族自立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有着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和德国的哲人们对“纯粹理性主义”是否能够成立、启蒙精神是否需要推崇等问题激烈论战的思想根源。在早期阶段,“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实际上是与意大利和德意志东普鲁士时期的思想家们论述的更为宏观的哲学、历史、文学思想及政治主张裹挟在一起的。这些思想家,在意大利主要有维柯,在德国则有哈曼、歌德、席勒、赫尔德、费希特等一批“浪漫主义”者。^⑤其中维柯和赫尔德的表述相对直接和集中,具有代表性。

(一)维柯的主要论述

依据维柯的主要著述以及国内外已有的、但很零散的研究成果,似可以将维柯不自觉地表

① 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第190页。

② [意]卡洛·安东尼著、黄艳红译:《历史主义》,第39页。

③ 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5页。

④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⑤ 参见[美]理查德·塔纳著、吴象婴等译:《西方思想史》,第403页。

述过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归纳为如下几点:

其一,文化是由特定社会所有行为的模式构成的,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完全独立地形成的。维柯认为,一个整体社会,其思想、艺术、制度、语言、生活方式都反映出一种共同的风格或普遍的模式,这个模式便是文化。^①并说“文化就是世界相对于社会的意义,就是男男女女对于他们自身与别人和环境发生关联的集体意识;文化影响思想、感情、行为、举动的特定形式”。^②这一看法无意间为文化下了定义,而在维柯之前似乎没有人对“文化是什么”做出过论述。维柯还认为,一个“民族”,从词源学来看就是一种“出生”或“出世”,就是具有一种共同起源、具有一种共同语言和其他制度的同种或有血缘关系的一族人(当然,维柯这里使用的“民族”一词,不同于现代民族)。而“民族的世界是由所有的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摆在一起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后来这些民族在商业、外交、结盟、联邦、战争与和平条约方面互相发生关系时的那种民族世界,在这以前它早就被创造出来了,甚至在他们还完全互相隔离开的那个时期就已被承认为存在”。^③也就是说,在维柯看来,民族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的文化的世界,而各民族创造了各自完全不同的、独立的文化。

其二,文化完全是人类心理的产物。对于理性主义哲学家来说,一切关于自然和人的真理都是普遍的、客观的和永恒的。但维柯认为,抽象地运用“理性”得来的知识是缺乏历史根据的、乌托邦的、僵硬的、傲慢自大的和毫无感情的。他更倾向于主张通过经验获取知识,即赞同和主张经验主义的知识观。认为人类唯一能够确知的是自己做过或经历过的事情,而“从本质上说,人类的文化和过去事件的历史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人类心理的产物”。^④同时,他还认为,“人类最能卓有成效地认识的领域不是物质的自然,因为是神创造了物质的自然,也只有神才能认识它。人最能认识的是历史,是人所创造的‘民族的世界’”。^⑤

其三,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文明和价值标准,互相之间不存在可比较性。维柯认为,每一个相继出现的时代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它们在“永恒的理想史”中每一次循环的相应阶段会重复出现,虽然可能有一些变异。所以,“没有必要对每一种文化阶段及其作品,以及它背后所承载的生活、社会行动方式加以比较,或根据某种惟一的优劣尺度把它们分成三六九等”。^⑥在他看来,不同民族的制度,或不同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之间没有统一的尺度,“一种文化的子孙能够学会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生活和思想、行为方式、艺术、宗教、整体人生观,能够理解有些东西我们的祖先可以创造,而我们却不能,这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和他们分别处在同一个循环中的不同阶段上”。^⑦

其四,人类社会不存在普遍的、永恒的文化价值标准或真理。对人类社会是否存在真理的认知,建立在是否承认“人性”具有统一性的基础之上。对于持进步信条的启蒙思想家而言:无论何时何地,“人性”都具有统一性的一面,统一性是它的内核。“人性”在地方性的或历史中的多样性,与恒久不变的内核相比是不重要的。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适用的目标,通过人类的理

① 参见 Sir I. Berlin, *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xxvii.

② [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著、杨祯钦译:《伯林谈话录》,第32页。

③ [意]詹巴蒂斯塔·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英译者的引论”部分第15页。

④ [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著,刘北成、王皖强编译:《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页。

⑤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陆月宏译:《历史主义的兴起》,第45页。

⑥ [英]以赛亚·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53页。

⑦ [英]以赛亚·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53—154页。

性,“可以制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易于检验和证实的法律和通用规则的结构,以此取代无知、精神惰怠、臆断、迷信、偏见、教条和幻觉所造成的混乱”。^① 也就是说,启蒙思想家们关于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世间存在着真实的、不变的、普遍且永恒的真理,它们对一切人、一切地方和一切时代都是正确的,譬如,对真善美的理解;这些真理或价值至少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实现的,不管人类过去、现在或将来有无能力在世间实现他们;这些价值是一个和谐的整体。^② 但维柯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人性”是变化的,它没有一个永久持续的内核或本质,变化是它能够存在的形式。而且,支配人类历史变化的原因不是由“机械式”因素(维柯认为这是理性主义的根基)决定的,而正是由“人性”自身的天意模式确定的。^③ 他也认为建立在“人性”统一性基础上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真理是不存在的。

其五,人类的历史在本质上是循环往复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人类的历史总体上是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但维柯认为人类的历史或文明的变迁并不一定是向前发展的,很多时候其实是循环往复的,类似于有机体生长、成熟、衰退、再生的过程。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经历着三个先后衔接的阶段,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诸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阶段,人就骄奢淫逸起来,就失去了活力,种种社会罪恶也就产生了,随着社会罪恶的增加,人类就又回到了野蛮时代。所以,三个时代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他称这种循环为“人类制度的复演过程”。^④ 维柯还认为西方从罗马帝国灭亡后就转入了“黑暗时代”,回到了野蛮时代,到了但丁的时代又转入英雄的时代。^⑤ 他所谓的“永恒理想的历史”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以一种不变的循环方式,同过去、现在、未来联系在一起的。

维柯的上述思想,在启蒙运动的早期时代,无疑是对启蒙信条之一——科学理性主义和进步观念——的反叛。虽然他本人从未明确使用过“文化相对主义”一词,但从思想内涵上讲,他对“人性”统一性的否认,对真理或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的质疑,尤其是对不同文化在价值上具有独特性和互相之间不具可比较性的主张,其实就是他最先阐发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而这些思想或理论主张无疑也是后来者思想的源头。

(二)赫尔德的主要论述

概述赫尔德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需要提及一下德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康德和哈曼,这二人都是德意志东普鲁士时期哲学界的巨星。^⑥ 在许多德国古典哲学家看来,起源于法国的启蒙精神就是理性主义、批判精神、自由主义理想和历史进步观念。黑格尔(Hegel)讲,“康德哲学是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的系统陈述”。^⑦ 但哈曼却以批判理性主义、启蒙运动而著称。哈曼在1780年出版的《纯粹理性元批判》,是德意志哲学家中最早对启蒙运动做出批判的论著。哈曼由此开启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和反叛法国启蒙主义理想的进程。^⑧ 赫尔德在格尼斯堡大学求学期间,一开始是康德的追随者,但后来他的学术兴趣发生转向,逐渐喜欢

① [英]以赛亚·柏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2页。

② 参见[英]以赛亚·柏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45页。

③ 参见 Sir I. Berlin, *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 xvi—xix.

④ [意]詹巴蒂斯塔·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第459页。

⑤ 参见[英]罗杰·豪舍尔:《〈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序言》,参见[英]以赛亚·柏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部分第20页。

⑥ 参见[联邦德国]卡岑巴赫著、任立译:《赫尔德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15页。

⑦ 参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358页。

⑧ 参见[英]以赛亚·柏林著、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第45页。

哈曼的“学说”到难以自拔。对此,有学者也认为康德和哈曼是“从两个相对的方向照亮了赫尔德前进的道路,并使赫尔德和他们一起并列成为格尼斯堡的三个哲人”。^①这一看法是有切实依据的。相关研究表明,哈曼和赫尔德的反启蒙思想最早是从维柯那里得到启发的。哈曼于1777年从佛罗伦萨得到了维柯的《新科学》一书,而歌德、赫尔德分别与1787年和1792年也得到了此著,他们在自己的有关著述中都对维柯的学说给予高度肯定。^②

通过梳理赫尔德的著述,可以发现他的著述中有一个或隐或现的主线:坚持批驳启蒙运动关于一个包罗所有实体的统一科学的观点。赫尔德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正是或隐或现于此相关的论述之中。概括起来讲,主要观点包含如下几点:

其一,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标准。维柯不但确立了文化观念,还阐发了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及价值标准的观点。赫尔德则将维柯的论点应运于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中,认为“不存在普适的、不变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和批判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气质、不同的创作素材产生的作品”。^③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他看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性格,这在它们所有习俗和制度、艺术和文学作品中是十分明显的,而且这种性格有它自身的内在价值”。^④他进一步指出,不同文明追求不同的目标,它们有权追求自己的目标。“我们不是古希腊人于我们无损,我们不是古罗马人也不是一种耻辱。力图使我们像古罗马人那样只会歪曲我们固有的本质”。^⑤所以,对每一项人类成就,包括文化现象及行为的评价,只能根据它自己的内在标准加以判断。^⑥

其二,民族是一个文化的实体,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但不同文化之间不存在可比较性。赫尔德认为,“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实体,同一民族的人说共同的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习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传统”。^⑦这里,赫尔德无疑不自觉地给民族下了定义。同时,基于“人性是一团软的黏土”的看法,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比较都是灾难……每个民族都在其自身之内有自己幸福的中心,正如每个圆球都有它自己的重心”,而“人类的道路就像迷宫,处处布满歧途,几乎找不到通往终极目标的路径”。^⑧所谓民族之间的“开化”与“蒙昧”、“文明”和“野蛮”,不过是量的区别,而非质的不同。这是因为“民族之画卷有五彩斑斓,依着时间和地点纷繁变化;而且,和所有图画一样,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观看的视角。如果我们用欧洲文化的理念作为标准,那么我们确乎只能在欧洲发现文化。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武断地划定文化与启蒙之间的界限,则我们是在迷雾中堕得更深,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与启蒙乃是不可分”。^⑨

其三,“民族”是人类种族最自然的、最神圣的分野。赫尔德在大部分著作中,尤其是在《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中创造了“一个关于民族差异的整个理论”:他透过遥远的时间和空间,发现

① [联邦德国]卡岑巴赫著、任立译:《赫尔德传》,第171页。

② 参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陶秀璩等译:《维柯的哲学》,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③ [德]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著、张晓梅译:《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译者序言第2页。

④ [美]菲利普·巴格比著、夏克等译:《文化:历史的投影》,第17页。

⑤ 参见[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著、杨祯钦译:《伯林谈话录》,第32页。

⑥ 参见[英]以赛亚·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3页。

⑦ [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著、杨祯钦译:《伯林谈话录》,第95页。

⑧ 转引自[德]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著、张晓梅译:《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8页。

⑨ 转引自[德]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著、张晓梅译:《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20页。

了各地古代的“民族”，这些“民族”不仅包括欧洲的“民族”，也包括亚洲、非洲、美洲及海岛上的“民族”（显然，赫尔德所述的这些“民族”其实是英文中“peoples”，而非“nationalities”——笔者注）。他认为，这些“民族”，“起初因地理与气候上的特质而封闭起来；后来各有其特殊的历史传统——一种适当的语言、文学、教育、习尚、风俗；因此他们便各成为一个完备的民族，具有一种‘民间性格’，一种‘民族魂’和一种真实的民族文化后，个人便以他们民族的‘性格’为特征”，而这种“性格”对于民族的成员而言，即使迁居它国数代后，仍然不能消灭。^① 他由此讲到，民族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原则，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而民族精神是最自然，最合理的东西，民族也是人类最合理和最神圣的分类。^②

其四，基于民族文化的“人性”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人性”是否具有统一性的问题，赫尔德基本追随了维柯的思想，但他说的更为明确。认为“人性绝非一个容器，盛着某种像哲学家们定义的那样绝对的、独立的、不变的幸福（实际上指最高道德标准——笔者注）”，“它是一团软的黏土，不同的条件、需要和压力，就被塑造为不同的形状”。从民族来说，民族是文化的实体，不同的民族便是各不相同的文化实体。但由于不同的文化价值标准不具可比较性，所以各民族文化中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随着背景和气候每每变化的”；“每个独特的民族，都倾向于独特的民族幸福的形式，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间的距离被越拉越大。……每当两个民族的禀赋和视域相碰撞，就生出我们称之为偏见、群氓之见和狭隘民族主义的东西！但若时间与地点恰当，偏见也是好的，因为幸福正可以从中生出来。……在这种意义上，最无知、偏见最深的民族通常也是最幸福的民族”。^③ 很明显，在赫尔德看来，适用于所有民族或文化实体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不存在的，人性“统一性”的一面也就是不存在的。一切现象或行为是否符合人类的道义，完全依某个民族自身的文化标准而定。

同维柯一样，赫尔德也从未明确使用“文化相对主义”一词，但这不影响我们赋予他们文化相对主义思想早期代表人物的称号。这正如伯林所言，虽然赫尔德本人从未使用过“文化民族主义”一词，但人们仍将他奉为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之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之父。^④

四、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

维柯与赫尔德的上述思想是对“持续影响西方两千年的‘永恒的哲学’的第一次全新革命和颠覆”。^⑤ 有学者认为，维柯和赫尔德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在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狄尔泰(Wilhelm Dilthey)、韦伯(Max Weber)，以及一些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形成了这一阶段文化相对主义的特点，并将此阶段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称之为其发展的第一阶段。^⑥ 这一看法是国内学者对文化相对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第一次明确承认，对我们探究文化相对主义发展史具有不言而喻的启发意义。但将维柯、赫尔德与他们身后的上述几位思想家们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一起归为发展的第一阶段似乎不够

① 参见[美]海斯著、帕米尔等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页。

② 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42页。

③ [德]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著、张晓梅译：《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8—9页。

④ 参见钱雪梅：《文化民族主义刍议》，《世界民族》2000年第4期。

⑤ [英]以赛亚·伯林著、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第71页。

⑥ 参见何萍：《文化相对主义：历史演变及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准确。在笔者看来,上述思想家们后来阐发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虽然与维柯和赫尔德的论述有相通之处及某种承继关系,但他们之间在学术立场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克罗齐、狄尔泰、韦伯、新康德主义思想家们等都是启蒙精神坚定的追随者。启蒙精神总体上推崇的是世界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则恰恰相反;启蒙思想家立志于为世界“祛魅”,要破除神学思想对人的束缚,维柯和赫尔德阐发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却始终没有脱离神学的窠臼。这种区别是本质上的。

所以,若从上属意义上讲,维柯和赫尔德所阐发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才应属于第一阶段。笔者以为,维柯和赫尔德的论述实际上也已经形成了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依据前文所述,可以将其理论要点归纳如下:(1)排斥科学理性主义和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观念。(2)否认人类社会存在普遍性的最高道德标准,否认基于文化基础之上的“人性”具有统一性,否认现代知识观中的真理。(3)认为文化是由特定社会的所有行为模式构成的,是人类心理的产物,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和价值标准。(4)认为民族是文化的实体,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立的、自成体系的。(5)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独特的价值,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不存在可比较性。(6)坚决反对对任何不同(民族的)文化作价值比较及排序。

之所以说这些论点实际上已经形成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是因为作为一种反对文化霸权、追求民族文化地位平等的思想理论,这几条所构成的内容在逻辑体系上是基本完整的。其逻辑关系为: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它的哲学基础;反对启蒙信条是它的理论出发点;坚持民族文化价值的相对性是它的基本理论主张;反对文化霸权,追求民族文化地位平等是它的现实诉求或目标;批判性和工具性则是它的基本理论品质。

从理论渊源上看,早期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后来形成学术流派的文化相对主义,它们都共同地反对文化霸权,反对将不同民族的文化做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的阶梯式排序,强调不同民族文化在价值上的不可比较性,强调和张扬不同文化价值的独特性。而这些主张均源自于维柯和赫尔德的前述论点,前后的基本思想及内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从其包含的思想内容上看,维柯、赫尔德身后的学者们所讲的“历史相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等,其实都是从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要点之中衍生而来,因而所溯及的思想起源者仍然是维柯和赫尔德。当代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安东尼(Caro Anthony)评论说,维柯与赫尔德是历史上率先有意识地抛弃了理性主义价值准则的哲人,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正如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美学规范一样,也不存在任何绝对的道德准则。一切都与时代、民族及其独有的理想标准相关,这种认识实质上就是价值相对主义。^① 安东尼的评价有切实的依据。而且安东尼所说的“价值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并无二致。

从批判对象上看,文化相对主义是最先作为批判启蒙信条——科学理性主义和进步观念,以及法国文化霸权的理论工具而出现的,这在维柯、赫尔德那里都是如此。但在20世纪初期文化相对主义学派形成时,它的主要理论批判对象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进化论和种族主义。显然,前后批判的对象不同。而且,维柯与赫尔德阐发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主体基本上都是以民族为载体的文化,但随着他们的思想被逐步传播、发展,衍生出许多次生形态或更为泛义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说”,例如,宗教群体、女权主义者、公开的同性恋群体等,也以自身的文化具有正当性和不可侵犯性的名义来伸张诉求,其公开打出的也是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帜。

^① 参见[意]卡洛·安东尼著、黄艳红译:《历史主义》,第68页。

赫尔德之后,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逐渐被不同思想体系的学人们所继承、发挥,并扩散至整个西方社会思想领域,最终于19世纪末期成为一种非主流、但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化思潮。文化相对主义产生之后就作为西方主流思想体系——科学理性主义的对立面而长期存在,在赫尔德之后,它的一些思想因子才被一些坚持科学理性主义学术立场的学者所吸收,从而模糊了其根本性思想立场的界限。维柯与赫尔德的思想除了被明确反对科学理性主义的学者,如韦斯特马克、斯宾格勒、博厄斯等人所继承外,也被坚持科学理性主义的学者们所吸收、改造,例如,20世纪初期的经典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所阐发的“历史相对主义”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赫尔德思想的启发。^①而博厄斯创立的“文化相对主义学派”,则使文化相对主义在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散和泛化。同时,伴随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理论的出现,文化相对主义也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最终完成了从学术认知向政治伦理层面的扩展。

当然,文化相对主义在遭受异族奴役和种族制度压迫的民族(种族)之中的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也是借助于赫尔德首创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流布而实现的。这是因为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在形成过程中,首先与文化民族主义结下不解之缘。^②二者在其后的扩散中,亦是相互裹挟、相互借助的,也可以说二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文化相对主义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构成,虽然自其产生后不断成为许多文化落后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知识精英们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反对民族压迫、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理论武器,但由于它否定了在启蒙运动中才得以确立的人类历史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观念,否定了评价人类文化的客观标准,使得落后民族或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常常具有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尤其是在文化民族主义的故乡——德国,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理论构成的文化相对主义,虽然首先成为德意志知识精英们认同、赞扬本民族文化及精神的思想依据和追求民族自立的理论工具,但不久也变成了一些人对“他者”文化排斥、诋毁的理论依据。因为这一观念从费希特开始,就发展成为了德意志民族在种族、语言和思想性上均优越于其他民族的观念的理论依据。而这种观念“后来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不仅对德国的历史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使本来诉诸民族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蒙垢”。^③在完成民族独立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中,文化相对主义也被一些人消极借用或反转使用,成为他们追求非理性民族(种族)利益的思想资源。譬如,在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民族政策的国家中近些年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新种族主义^④问题等,在某种意义上也与文化相对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消极影响紧密相关。

〔责任编辑 马俊毅〕

① 参见苏国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总序二》,〔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Ⅷ页。

② 学界公认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鼻祖是赫尔德,而他同样也是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的主要阐发者。也正因为如此,学者们一般都就将文化相对主义思想视为赫尔德首倡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参见钱雪梅:《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世界民族》2001年第2期。

③ 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78—79页。

④ 新种族主义是20世纪末期以来主要在欧洲出现的一种以排拒移民为目的的极端民族主义。其极端思潮体现为:认为移民群体腐蚀本民族的“道德品质和生物纯洁性”,主张“为了净化共同体(即本民族——笔者注),需要对共同体中的外来成分以及族裔少数民族群体采取强硬的态度”等。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and narrative of Taiwan revolution emphasized the role of Taiwan people in the Chinese Nation's anti-Japan commun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Han(汉) and the Fan(番). 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a common community which related closely to the revolution narrative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Fan(番) of Taiwan in the Chinese nation identity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 modern China; nationalism; Wushe Incident; Fan(番) of Taiwan.

The Origin and Early Thoughts of Cultural Relativism Yang Xu'ai(107)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lativism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thoughts meant firstly a rebel for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deas, especially a critical reflection for the French culture hegemony, scientific rationalism, etc., in the 18th century; however, the school of cultural relativism appeared in American cultural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had the different criticism object and the same basic thoughts in contrast to cultural relativism. The main theoretical sources of the early cultural relativism included western relativism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anti-enlightenment doctrine, "culture" concept and ethnic ideas. Giovanni B. Vico and Johann G. Herder were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arly thoughts of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their discussions actually formed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relativism. After that, this theory gradually spread to the whole western social thoughts, and became a kind of trend of cultural thought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sum, cultural relativism not only w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cultural nationalism, cultural pluralism, cultural diversity theory, multicul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but also a theory guiding western anthropology, which has exerted its influence to today.

Keywords: cultural relativism; school of cultural relativism; theoretical sources; early thoughts.

A Comment on *Studies on the Persistence and Improvement of Ethnic*

***Polic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ng Xi'en(120)**

A Summary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Ethnology in 2014* Wuritaoketaohu(122)**